

协商民主与“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 ——对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原因分析

邱新有, 吴佩芝

(江西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因其特殊性而广受争议, 现因其取得巨大成就而备受关注。任何一种制度的背后, 都有其理论和思想基础。研究中国政治制度, 必须重视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性。文章试图从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得失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渊源, 借助“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分析我国实施现行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层原因, 论证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十分必要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 “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 协商民主; 中国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 01-0025-07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yramidal Ethics ——A Reaso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Governance Mode

QIU Xinyou, WU Peizhi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wa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 have become somewhat controversial on account of its particularity, and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Every system doesn't emerge in a vacuum and has its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basis. It also can't be used without drawbacks a period of a hundred generations, and can't work in every country. The study of China political system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ins and losses of Chinese ancient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 contained in it,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deep reason of our country's current governance model with the aid of the "Pyramidal" ethics, and prove the necessity and the rationa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Key words "Pyramidal" ethic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hinese system

引 言

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大学讲演时说“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 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 这话明确地告诉全世界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

收稿日期: 2014-11-11

作者简介: 邱新有(1964-), 男, 江西贵溪人,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政治传播。

吴佩芝(1992-), 女, 江西抚州人,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治理道路。任何国家制度和治理模式的背后,都应该有理论和思想作为基础,都既有其历史文化渊源,也有其现实作为背景。中国选择走今天这条道路,也不例外,也应当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依据。本文将从中西双方最初的民主起源开始谈起,选取汉唐两代主要政治制度与思想为分析对象,着重讨论中国在“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深刻影响下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中西方民主之起源

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被视为是西方文明的起源,是西方哲学、文学以及国家制度的基石。“希腊城邦——尤其雅典——是民主制度的摇篮。”^{[2] (p1)} 在希腊的辉煌时期,并不是单一制国家,而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从这些小城邦里萌生”。^{[3] (p9)} 这里的一个“国”,仅仅是一个城市,公民人数一般不超过万人,等于近代国家一个小城市或乡镇的人口。公元前411年,寡头为政时期,雅典在籍公民限为五千。^① 因为“人口太多,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终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4] (p360)} 他们要选举领袖或者决定公共事务,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在一片空地,就可以形成所谓的“公共领域”表达人民的意见,这便是西方选举制度之始。罗马帝国一开始也只是一个城市,后来向外侵略扩张,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制度。

在中国,早在国家形成之前的尧、舜、禹时期,尧、舜、禹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就实施着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共政”部落联盟会议的机制,即在处理部落联盟的公共事务诸如治水、选任接班人等重大事情时,都经过部落联盟会议来讨论决定,然后再由部落联盟的首领进行实施,这种模式既有君主专制制度的萌芽,又有原始民主制度的痕迹。

这种共政的形式与我国现在一项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着一定的契合,甚至可以被看作协商民主的雏形。后来,尧、舜、禹时期的“共政”制度的基本观点多被集中记载于儒家经典著作之中,其传达的如“天下为公”^{[5] (p8)} “任人唯贤”^{[6] (p129)} 等思想为后来历朝历代发展演变的谏言制度提供了文化源头并有着启示作用。

这个资料说明,即使很多人不愿承认中国有民主的传统制度,但民主的传统思想和实践肯定是有。在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度之后,历史上士大夫的“谏言”、稷下学宫的议政、民间小报的“舆论”等若干文化经典中均可看到协商民主的雏形,尤其是两千多年前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 这样蕴含着原始民主因素的表达,仍然影响着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国家的治理行为。

二、整理国故

在关于西方理论和中国道路的问题上,胡适曾经说过“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8] 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文化灵感,更要从文化灵感中寻找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正如爱德蒙·柏克所理解的那样,不要全盘否定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要一代代白手起家,不然就是在做“没本钱的生意”。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即使只讲政治史也极多变迁,若按朝代一个一个叙述恐笼统而不着边际,故本文主要选取汉和唐作为“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9] (p40)} 这也是政治制度与思想多有创建的两个朝代。具体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分析,一是组织和职权分配制度,二是选举和科考用人制度。

1. 组织与职权分配制度

汉代中央政府里的最高官,就是所谓的“三公”“九卿”。三公即丞相(又称宰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卿可以管到皇宫的一切,又全部隶属于宰相,换句话说,宰相可以管到皇宫的一切。当时的皇宫代表政府,

① 关于城邦公民人数的讨论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2页。

这样,宰相掌管国家政府的一切事务,可以说是当时政府的首长。那么皇帝呢,“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9][p8]}可见皇权和相权的划分自古有之,国家事务从来都不是仅依据皇帝喜恶来决定,都需要经过群臣商议和征求民意。如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下诏各郡推举贤良集聚京城,调查民间疾苦。在这次聚会上,贤良们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方专营,与政府大臣就汉武帝时期便推行的著名的“盐铁政策”展开激烈辩论。这其中有一位贤良代表还将这次会议记录整理改编,撰成著名的《盐铁论》,这位贤良也因此被当今史学界熟知,他就是桓宽。

相对于汉代由宰相一人掌管国家行政大权,唐代则把相权分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个衙门:先由皇帝主持、大臣们议政,皇帝决定后,中书省拟定和发布决定命令,送与皇帝画一“敕”,可见唐代政府出命之权在群臣议政中,皇帝是同意画敕的决策者;门下省对于皇帝画敕的命令进行复审,有“封驳”“驳还”之权;尚书省仅有执行命令之权。如遇门下省对命令封驳,此命令即白费,皇帝之“画敕”亦无效,便有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合协商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此一例便知中国传统政治并不是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蕴含着自己所特有的民主因素。

2. 选举与科考用人制度

古代官员的封建世袭制度在秦汉时期已被推翻,地方政府可以向中央选举人才,这就是汉代的“乡举里选”。这样的选举,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无定期选举,中央政府因突发事件如遇到饥荒、旱灾、瘟疫等时,下诏地方选举“贤良”,“贤良”是指有突出才能的人,可以由政府官员所举,也可以是民意所举。第二种是定期的选举,诏令地方察举“孝廉”,在汉武帝以后逐渐形成制度,一年一举,又分区察举,并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定额,一个郡满二十万户要察举一个孝廉。第三种是特殊的选举,比如政府今年要出使西域下诏征求精通外语之才,或者黄河决堤需要晓习治水之匠,可以推荐也可以自荐。被察举的人要正式入仕从政,必须经过中央规定的一番考试,当时“政府的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9][p21]}这样的政府,我们已不能称之为“贵族政府”,官吏之中贵族子弟究竟是少数,可以说中国政府历史上从此“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9][p21]}在西方,贵族集团垄断仕途,直到近代仍见此制,而中国,早在汉武帝之后就变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选拔官吏最初是依据各地之群众舆论和公共意见,而贤人则代表主要的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这和近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不同,西方是从“众”,中国传统观念是从“贤”。

到唐代,汉代的选举制度演变成了“考试制”,而欧洲人采用这一方式选拔国家官员已是19世纪的事了。唐代科举制度“开放政权”,不需地方长官推荐,不需九品中正评定,由个人到各自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政府统一的考试,惟一限制是“身家清白”,即未触犯过国家法律和不得是商人或工匠。考试合格便有了做官资格。后来的实际分配用人,再由吏部考试。

三、“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

上面我们通过对国故的整理,寻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组织和职权分配制度以及选举和科考用人制度中的文化灵感,并从这些文化灵感中寻找到了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然而,为什么西方能从古代文明中走到现代民主道路上去,而中国却没有走到“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上去?

中国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治理一直以孔孟之道作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10][p201]}且随着历史的推进,帝国的朝廷和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日甚。只是为了适应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需要,儒家的伦理被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加上了理智的新因素和诠释,使得它能更好地为集权的中央政府服务。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古代中国都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在天下传播作为主宰,天子和臣民都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正因为有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认同,使得我们的帝国在精神上有着一套统一的纲领。而这种统一精神的文化核心,即是儒家伦理

道德系统。

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系统,我们可将其分为三大块,即:伦理道德的理念系统、伦理道德的范畴系统、伦理道德的辅助系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鼎足而立”的儒家伦理道德系统。^[1]但笔者以为其更像“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①这种伦理道德系统是在古代中国特殊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的。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影响着人的行为的呢?从三个系统的具体内容来看,它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处于顶层的是理念,如神圣之“天”、先验之善性,这些理念层面上的思想系统,影响着人的观念;在此观念影响下产生中层的行为范畴,即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又在这些行为范畴的影响下,通过底层的蒙学、家训等辅助系统进行整合,从而影响着人的行为。正因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系统采取了这种最具稳定性的“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使其生命力极强,普泛性极广,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具体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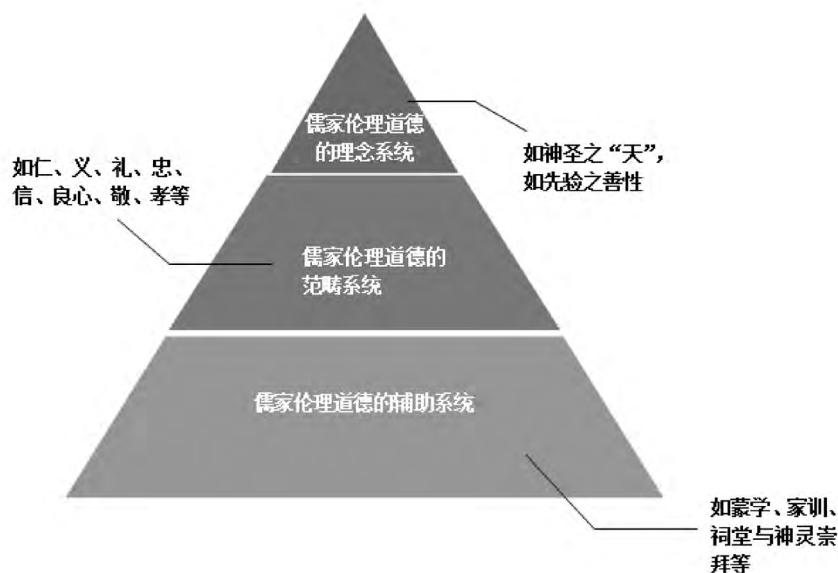


图 “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

长期以来,“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不仅在上层建筑对中国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政治制度背后精神与思想的主要文化根源。在现实层面则是通过金字塔的底层,即蒙学、家训、祠堂与神灵崇拜等辅助性系统来实现的。这些辅助性手段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极强的道德整合力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要通过具有血缘关系之家长的口传身授,使可能给人带来不便不适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具备亲和性与人情味,使人们极自愿地遵循之;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祠堂祭祖和神灵崇拜等活动,使传统伦理道德具有某种神圣的超越性,使人们对之产生敬畏感和崇拜意识,能极自觉地践履之。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真正从理念转变为范畴,又进一步从范畴化为大众日常生活里实际遵行的规范。中国社会的系统、政治的系统、文化的系统、教育的系统、民间的系统等等,无不围绕着这一系统在运行。这一切理论上的建构和强大的社会辅助系统的共同作用,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提供思想根源,并保证其稳定发展。这种共同作用的直接后果,就是可以培养出一大批在外守规矩、在家是孝子、在国是忠臣的“臣民”(又称子民),从而实现传统社会的和谐。

四、协商民主与中国治理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协商民主与中国治理的问题就有据可循了。可以说中国的传

^① 这是邱新有根据自己十多年对中国农村民主选举的调查研究,在江西师范大学双休日作主题为“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民主选举”讲座上提出来的。

统政治观念,对意见之抉择判断,从来都不是依据西方所谓民主之精神,即大多数人同意的原则。从来只闻朝廷议事,从未闻朝堂之上有投票表决,更不依此决定意见。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贤均从众”,^[12]哪个人是贤人,就采纳哪个人的意见,只有当双方均贤才依据数量从众。这一观点在前文所述汉代的选举制度上极为明显,随后无论是九品中正制还是科举制,都是如此。这和西方民主制度很不相同,西方以投票的“量”来决定,而中国从来都注重“质”而不是量。这种政治思想和精神是中国的文化基因深植于中国,也是中国实行协商民主制度的一个历史文化渊源。

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政府1998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标志着体现现代法制精神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在农村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这一立法的正式颁布,是经过十多年试行后才正式开始实施的,这是政府在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政治自由方面的进步。但是在一个相对长时期处于“大一统”关系、又保有传统人文社会形态的中国农村里,受“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的影响,国民的本质仍然具有“臣民”特性,村级直选看似公平合理,但参选人和村民都不具有进行民主选举的心理条件和自我利益保护机制。从1999年开始,我们建立了一支科研团队,在C、T两县按分层抽样方法各选择了20个行政村,且在每三年一次的换届选举中,组织了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到现场进行选举观摩,然后由这些现场观察的专业研究人员将观察到的情况撰写成选举观察报告。这些观察报告有些已经公开发表在不同杂志上,但大部分观察报告都结集出版,主要分散在《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对十五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宗族、乡村权利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书中。我们从这些观察报告中发现,选举过程中问题多多,矛盾不断,选举结果还存在着被否决、被搁置、被扭曲的现象。

下面摘录几个案例:1999年中国农村全面实施海选村官,江西仲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却在一开始就认为这不过是乡里又玩的“把戏”。选举分为四个选区进行流动票箱选举,因范围较大且村民居住分散,投票率很低,存在如村民不会写字由他人代写、因名字写错而造成争执、参选人在旁边似乎不情愿但碍于情面照办等种种问题。谈到对这次选举的看法,参选者邱发明说“比以前民主,但宣传工作没做好”,另两位参选者邱星火和邱有任则分别表示“选不到是很丢面子的”、“常有彻夜难眠的现象”。而选民们起初并不在意,后来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并都希望把本族的人提为候选人,表现出明显的宗族意识。虽然也有思想觉悟较高的老党员,但在民主意识刚刚萌芽的中国乡村,这样的村民总是少数,绝大部分的村民仍旧存在“臣民”意识,血缘和亲情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使得中国基层民主的推行困难重重。最后邱星火作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最终以失败告终,觉得面子尽失,选举结束后一周都没有走出家门。^{[13] (p35-65)}

1999年底,T县的“洲村也进行了换届选举,曾军明为了取胜,到处张贴大字报和散发传单,在激烈的角逐之后,还是落选。后觉得没有脸面再在村里呆下去,一气之下,当天晚上就偷偷地外出打工去了”。^{[14] (p480)}

C县的铁村选举竞争同样很激烈。“当天晚上十多点,唱票才结束,谭国煌因没有进入候选人名单,一气之下在选举现场踩踏票箱,甚至大打出手。”^{[15] (p138)}

上述类似案例其实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不可否认制度必须适应现实时时变动,但历代政治制度都是不断生长的,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精神传统。我们今天的一切改革在注重自己历史截面的同时,要兼顾自己国家的实际,盲目模仿外国制度,忽略本国“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影响下的民众特性是不可取的。中国的现今实行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如立法过程中民意表达的听证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恳谈会、社区议事会、网络论坛等丰富的协商民主形式,“这些多样性的政治形式,在维护民众的利益、鼓励民众利益表达、促进公共利益、推动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包容不同利益诉求,维护社

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6] 1991 年 3 月江泽民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这是西方民主无可比拟的,也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更能真实地体现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17] (p488)}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的公民精神甚为赞同,他认为自由结社与热情参与是美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征,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却发现,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这种公民精神在慢慢衰弱。现今中国虽然很多人聚集“一起跳广场舞”,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当然应该以人民的意见为主,但不是、也不能一定要全体民众来直接决定所有事。政府也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将“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指出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以此强调全民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协商民主的根本正在于使人民或其代表能够通过理性的交谈,而不是简单一人一票原则和多数决定原则,通过协商达致共识,使得理性的个体更好地参与事务的决策。由此可见,在推进民主化进程方面,“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8] (p3)}

五、小结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关于国家制度与治理有很多流弊,但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两千年来不断修改,以后自然也仍需要不断修改,必须认识的是“革新固当知旧”,^{[19] (p2)}任何制度的设立与变化都不能脱离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由此造成的本国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特性。今天有些人反对和抹杀自己的文化传统,可是历史已成历史,更成为今天的现实,怎么抹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把别人的文化传统横插进自己的发展中。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新道路,但传统政治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仍旧存在和深刻影响着现今中国人的行为,在“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的影响下,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个性仍然有“臣民”特性。从前文多次提到的村级直选相关观察到的现象可以发现,村民虽生活在 21 世纪,却深受“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的影响,中国要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有点艰难,至少目前困难重重。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20]中国采用现有的协商民主模式与西方不尽相同,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这是由自身历史文化渊源和当代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孙中山先生在回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问其革命思想的基础是什么时说“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当今中国改革思想的基础,也应继承这一道统思想,并充分意识到在“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影响下广大民众依旧存在的“臣民”特性。

总之,西方民主制度之经验肯定有可借鉴之处,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思想,如何利用自己的传统经验,走出一条新的中国道路,如何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别人,忽略自己,别人的制度和思想也不可能有利而无弊,样样学人不免东施效颦。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 年 3 月 25 日(02).
- [2] [德]克劳斯·伯恩德尔等. 辉煌的帝国:希腊与罗马文明的开端与兴盛[M]. 黄洋、赵立行、周兵、陈新等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 [3]〔澳〕约翰·赫斯特.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M]. 席玉苹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5]礼记·礼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1987.
- [6]尚书·咸有一德[A]. 蒋善国. 尚书综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7]孟 轲. 孟子[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8]胡 适. 新思潮的意义[N]. 新青年, 1919(6 卷 1 号 10 页).
- [9]钱 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 [10]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1]郑晓江. 论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教化的辅助系统[C]. 炎帝与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2.
- [12]左丘明. 左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13]肖唐镖. 宗族、乡村权利与选举[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
- [14]李连江. 村委会选举观察[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15]肖唐镖, 邱新有, 等. 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6]借鉴现代民主理论新成果 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访谈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和经济研究中心陈家刚博士[J]. 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 2008 (2).
- [17]江泽民.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M].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 [18]〔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张瑞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9]钱 穆. 国史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0]温家宝.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EB/OL]. 新华网 2007 年 2 月 26 日.

(责任编辑: 余小江)